



考古发现漫笔

曹家骥 著

为寻找由于战争、变乱而丢失的文化遗产，人们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推移，而有丝毫的懈怠。出于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爱、追求和保护，他们依然做着艰苦的努力……

寻找

北京人

白以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寻找“北京人”

考古散记

张之彬题



考古发现漫笔

曹家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北京人:考古发现漫笔/曹家骧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7

ISBN 7—5325—3355—7

I. 寻... II. 曹... III. 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1087 号

寻找“北京人”

——考古发现漫笔

曹家骧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7 $\frac{1}{9}$ 插页 5 字数 296,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355—7

K·451 定价:35.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序

近日收到我的朋友曹家骧先生的书稿《寻找“北京人”》，他嘱我为此书写个序。多年来曹家骧先生以其新闻记者的身份，唯真、唯实地为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奔走呼号，使全社会对文物考古事业有了更多了解，使各级领导对文物考古事业更加重视。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深深地感激曹家骧先生对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这种奉献精神！《寻找“北京人”》是作者十余年来献身于祖国文物考古事业的真实记录，是他为中华民族的文物考古事业献上的一份厚礼。从朋友、事业两个方面来说，我都想借“序”谈谈朋友——曹家骧先生，进而谈谈曹家骧先生与他所关心的当前文物考古工作。

曹家骧先生长期工作在新闻单位，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他走遍了神州大地。丰富的中华文化，给予了他创作的舞台，这片曾经成为中华民族摇篮的土地，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经过长期新闻第一线采访的积累，曹家骧先生在文物考古报道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我们知道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往往是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曹家骧先生正是这样的百科全书式新闻工作者，这从他已出版的《大地之旅》（与沈庆吉合著）、新闻作品集《走遍中国》和即将付梓的《曹家骧文物考古日记》和本书《寻找“北京人”》就能反映出来。我想作为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曹家骧先生，他不只是知识广博，而且在文物考古学术领域他还有着精深的专业知识，因此他才能从独特的新闻视角写出像《寻找“北京人”》这样的好作品。

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诞生地。历史上这里又是中国古代最兴盛的周秦汉唐王朝的中心



活动地区。曹家骧先生多年来把这一带作为主要采访的基地。黄土地的文化积淀、深邃的人文资源,使他有了一个驰骋的环境。为此,他默默地对秦始皇陵兵马俑跟踪报道了整整8年,尤其是对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从酝酿到试掘以至阶段性发掘的全过程的报道,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对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考古发掘的许多消息都在国内作了最早报道,并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反响,也为日后在文物考古报道中逐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奠定了基础。

1994年1月,曹家骧先生撰写的《法门寺地宫秘密的破译》一文,率先报道了我国在佛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中国学者首次揭示了唐密曼陀罗的秘密。这篇文章作为当时改版后的《文汇报》一篇精心组织和策划的消息,在《文汇报》一版头条发表后,海内外传媒纷纷转发。这一发现被认为是近年来世界佛教界最重要的成果。作为《文汇报》的独家新闻,要比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当地的新闻媒体早一个星期。

曹家骧先生曾经与我谈过关于恐龙胚胎的报道。那是1995年春节前夕,鞭炮声在河南省省会郑州早已四处爆响,阖家团聚的欢声笑语也随处可见,人们早早地在准备着欢度春节了。当时,他刚刚完成了有关民工潮的报道,已经买好了返回上海的火车票。没想到,从张文军教授(时任省文物局副局长、现任河南博物院院长)那里知道了一件几个单位为蛋而“扯淡”的事。张文军说,郑州大学通过省委向文物局借了几只恐龙蛋,从其中的一只里发现了“小恐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第二天,一场北方几年来都没有遇见的大雪,把中原重镇郑州裹得严严实实。天冷得很,曹家骧先生又没有带多少御寒的衣服,跑到西郊的郑州大学的那天已是小年夜了,学校冷冷清清。几经周折,采访了所有的当事人,掌握了有关恐龙胚胎研究的全部情况和资料,一篇只有500字的消息《首次发现恐龙胚胎》于1995年2月21日见诸报端,这也是世界上首次披露关于远古化石中恐龙胚胎的存在和发现,并受到了海内外的各方关注。之后,这篇消息被评为当年上海市新闻一等奖,并被收进《上海新



闻奖作品选》和《文汇报60年文选》，上海知名新闻工作者石俊升先生和已故的全一毛先生都为这篇消息写过评注，认为“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好新闻”。

1996年底，湖南长沙在城市基本建设施工中，发现了一批数量惊人的古代简牍。曹家骧先生凭着新闻工作者的特殊敏感，立即前往湖南省长沙市，采访并撰写“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报道。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是本世纪以来我国考古界的一次最伟大的发现，所出土的17万片简牍，囊括了中国历史上简牍出土数量的总和，其丰富的文字记载有可能改写我国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历史。他用了4天的时间，跑了三座城市，在沪、湘、京之间穿梭。曹家骧先生想方设法，尽职、尽责、尽力，迅速发回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出土后保护现场的独家新闻与照片，5000字的长篇通讯《吴简十万惊天地》在全国作了最先的报道，受到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的表扬；3000字的《十万吴简怎么保护？》一文，最早提出了对这批珍贵文物进行科学保护的问题，见报后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领导部门还将该文转发给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有关部门。之后，他又先后发表了3篇有关吴简的报道，其中，报道了上海市金山县读者沈永平第一个带头捐款的消息，使全国出现了对“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进行捐款的热潮。

九十年代后期，他又开始关注中国人文遗产和自然遗产的追踪报道，《寻找“北京人”》、《秦始皇陵访谈录》、《何处骊山城？》、《世纪的寻找》、《贺兰山下的“东方金字塔”》、《走进兵马俑》、《保护是第一位的》等，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寻找“北京人”》一文发表后，在北京反响极大，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寻找五十五年前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活动，北京有关部门正式开通了寻找“北京人”的网站，一直持续至今。

曹家骧先生的《寻找“北京人”》是关于当前文物考古工作的缩影。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文物考古事业，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中国文物考古史上的“黄金时代”，该书中的《重访周口店》、《走进兵



马俑》、《阳陵：裸体彩俑的秘密》、《吴简十万惊天地》、《法门寺地宫秘密的破译》、《谜一样的西夏王陵》、《我所知道的中国水下考古》等篇章，再现了这个金光灿烂的考古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文物考古事业像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在取得辉煌成果的同时，也还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如文物保护与发展经济的矛盾问题、当前文物考古事业的管理机制问题、文物考古事业的专业人才问题等，曹家骧先生以记者对社会、对人民、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直面这些严峻的现实问题，撰写了多篇相关新闻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文物保护是个世界性问题，中国当然也不例外。文物作为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载体，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的不可再生性也是独具特色的。道理并不复杂，但是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有的人以发展经济、扩大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为由，不惜牺牲文物的保护。为了遏制这种有损文物保护的作法，曹家骧先生顶着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和压力，撰写了一系列新闻报道，唤起全社会的关注、各级相关领导的重视。实事求是讲，目前文物保护工作形势依然严峻。现在已不只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建设对文物造成的破坏，文物保护单位过度的旅游开发、文物景点管理的企业化运作（或商业化运作）、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高附加值农业的推广、文物市场的过度开放、国内外文物走私活动的猖獗等，使文物保护面临更多方面的挑战。

《寻找“北京人”》揭示的文物考古系统自身，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如何与国际接轨，如何更新观念适应形势发展要求，这些都是应该慎重对待的。如曹家骧先生的《博物馆的“饥渴症”》一文，提出了目前文博考古界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即关于考古发掘品的收藏权问题，这直接涉及上述诸多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考古部门进行的考古发掘属于科学研究活动，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从事考古工作负责人具有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领队资格，考古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也要具备相应考古学知识。这些要求是基于考古工



作是科学工作,考古学家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均系科学研究的结果,它们含有科研机构及其考古学家对其拥有的不可质疑的知识产权。在我们国家,地下文物和土地一样概归国有,像土地使用者拥有土地使用权一样,出土文物的使用权属于考古发掘单位,这种使用权是建立在科研部门对其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之上的。至于博物馆进行社会公益性展览,可以通过“借展”形式运作,其实国外一直是这样进行的。实事求是说,在出土文物的归属问题上,任何无视知识产权的作法都是不对的、行不通的。在改革开放多年的今天,一方面在“国家所有”的考古科研机构与博物馆之间,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无偿”调拨科研成果——出土文物的做法;另一方面又把文物工作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管理,博物馆内的所谓“重复”、“多余”文物可以“有偿转让”。这显然是行不通的。治疗博物馆的展品“饥渴症”很简单,公益性文物展览该“借”的文物展品就向考古发掘单位去“借”;非公益性的“盈利”文物展览,其文物展品该“租”的就“租”。这样使科研单位该享有的知识产权能够得到保障,使不具有科研成果(出土文物)知识产权的单位与人员得不到法律上规定的知识产权所派生出来的那部分经济利益。

中国的新闻记者不但要及时写出社会关注的、精彩的新闻报道,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写好内参,为主管部门、领导的决策提供咨询。曹家骧先生为此在主要采访工作中,都把比较大的精力放在内参上。

这些年他撰写的内参《陈独秀墓地作为重要人文景观应予开放》、《上饶地委对风景名胜区管理体制进行重大改革》等,受到中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重视,对所反映的部门产生过极大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这些部门的工作。《陈独秀墓地作为重要人文景观应予开放》发出后,在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安徽省、安庆市的负责同志的干预下,对陈独秀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修建,并经中央批准同意,在陈独秀墓地新建了“陈独秀纪念馆”。

在《寻找“北京人”》即将出版之际,我和我的考古界同仁们都由



衷地感激曹家骧先生。借此机会,我也衷心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今后能一如既往地关注我国文物考古事业,使之得到更加迅速、健康地发展。对于多年来我国新闻界朋友们给予文物考古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崇高敬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刘庆柱

2002年5月1日



目 录

序·····	(1)
重访周口店·····	(1)
寻找“北京人”·····	(9)
“北京人”还是我们的祖先吗?·····	(38)
人类的祖先在哪里?·····	(42)
岩画启示录·····	(59)
姜里城与《周易》热·····	(71)
里耶, 里耶·····	(78)
走进兵马俑·····	(92)
中国也有维纳斯·····	(108)
阳陵: 裸体彩俑的秘密·····	(110)
何处骊轩城?·····	(116)
居卢訾小记·····	(129)
吴简十万惊天地·····	(131)
隋代灞桥遗存袒露人间·····	(157)
国宝, 归来兮·····	(159)
玄奘顶骨今何在?·····	(177)
精美绝伦的唐墓壁画·····	(187)
无字碑的述说·····	(191)
法门寺地宫秘密的破译·····	(194)
看碑林·····	(209)
踏访“耀州窑”·····	(212)



中国的金字塔·····	(215)
谜一样的西夏王陵·····	(217)
黑水城记古·····	(226)
重现海上丝绸之路·····	(236)
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	(248)
世纪的寻找·····	(250)
从《四库全书》到《续修四库全书》·····	(262)
博物馆的“饥渴症”·····	(280)
反思录(代后记)·····	(289)



重访周口店

这是我第三次访问这座世界人类学的宝库和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摇篮——周口店“北京人”遗址。

1987年12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签发证书，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与长城、故宫、秦陵、敦煌等一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清单，于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成为世界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这些不仅肯定了周口店光荣的过去，也说明它在世界古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中处于不可动摇的地位。周口店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周口店是吸引各国朋友的文化圣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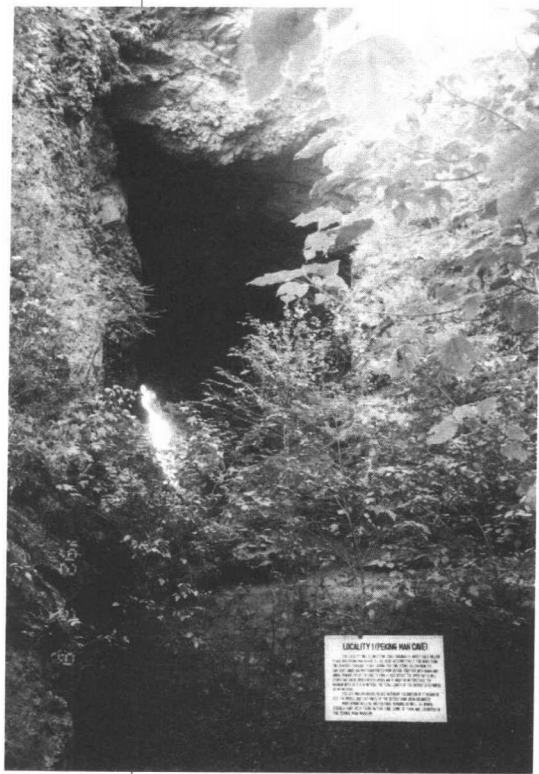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郊，距市中心约50公里。

1926年，科学家在周口店发现了古人类的两颗牙齿。1927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向周口店资助专款。当年即发现一颗保存良好的人牙。“北京人”这个名字是当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系教授的加拿大人步达生于1927年提出的。其根据就是上述3枚牙齿。这一拉丁文名字应译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北京人曾被称为“中国猿人”或“北京猿人”。当时北京大学地质系的系主任、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把“他”简称为“北京人”。

根据3枚牙齿而命名一个新的种、新的属，其材料当然是太少了。1929年12月2日下午4点多钟，离开大学才两年的青年科学工作者25岁的裴文中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相当于猿人洞剖面第10层的红色砂质粘土中发现了“北京人”的第一具头盖骨。这项发现为“北京人”的存在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1930年，在实验室里又修出一具头盖骨，它出土于猿人洞剖面或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第8—9层。1936年，在青年科学工作者贾兰坡





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洞)

的主持下,在第8—9层中又先后发现了三具“北京人”的头盖骨,他当时只有28岁。1966年,在第一地点的第3层中发现了额骨和枕骨,它们与1934年和1936年在同一层出土的两块头骨的模型恰好合成一具相当完整的头盖骨。

所以到目前为止,北京人的头盖骨共发现六具。除了1966年发现的标本尚存外,其余标本都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见了”。

在第一地点的第3—10层中,几乎每层都发现过“北京人”的化石,如牙齿和其他骨骼等。在周口店的西部有两座平行的小山,东部的那座山比较矮,名叫龙骨山。

它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90米,山顶海拔140.6米,1966年据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考证,龙骨山要比周口店河的河床高出66米。在龙骨山北坡有一巨大的洞穴,其东西长140米,南北向的最大宽度约40米,但其西端变窄,仅2米左右,向西很快尖灭了。在巨洞的北侧有一南北向的裂隙,宽约7米,“北京人”的第一具头盖骨发现于此裂隙下部的下洞之中。这一巨洞就是闻名世界的猿人洞,又称周口店第一地点。

猿人洞是发育于距今4.5亿年前的奥陶纪石灰岩中的一个喀斯特溶洞。在20世纪20年代,当这个溶洞刚被发现时,它的洞顶早已不复存在。洞内堆满了沉积物,总厚度超过50米。科学家把它划分为17层,其13层底部距今约73万年。相当于早、中更新世的界线。所以第14—17层属早更新世(距今多于73万年),第1—13层则属中更新世(距今少于73万年)。其中“北京人”化石产于第3—10层。



据古生物学家研究,第10层的底部距今约50万年,而第3层则距今23—25万年。所以“北京人”在周口店地区断断续续地至少生活了26万年(距今24—50万年)。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全部“北京人”化石计有:完整或比较完整的头盖骨6个,头骨破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2件,下颌骨15件,牙齿157个(包括连于上、下颌骨的),股骨断片7件,胫骨1件,肱骨3件,锁骨1件,月骨1件。这批材料分别出土于第一地点的第3—10层。

据古人类学家研究,“北京人”的平均脑量为1059毫升,而五个成年头骨脑量的平均数为1088毫升。从老到新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现代人为1400毫升)。古人类学家的研究还表明,“北京人”的肢骨比头骨进步,这种不平衡说明肢骨适应于直立姿势的发展先于头骨的转变。据他们推算,“北京人”男性身高为156厘米,女性为144厘米。

据考古学家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石器2万多件,考古学家研究了其中的17000件。“北京人”加工工具用三种方法,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锤击法是基本方法,砸击法是次要的加工方法,而碰砧法则是局部时间偶然应用的方法。

从时间顺序看,“北京人”使用石器可分为3个阶段。

早期:小石器很少,中型和大型的工具有数量较多。存在一物或一器多用现象,表明石器类型的分化尚不够明显。

中期:工具小型化趋势比较明显,大型和重型工具的数量锐减,一物或一器多用现象没有早期普遍,过渡类型的标本有所减少,类型界线进一步明朗。

晚期:出现新类型工具,如石锥。工具进一步小型化,加工技术亦有一定的改善。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承认,在“北京人”的时代,人类体质形态的进化似比技术的进步更为缓慢。

在1985年10月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第92页上有这样一段话,“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是最先使用火的人,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北京人”使用火





北京人洞剖面
第7、8、9层

的问题是当代世界学术界最感兴趣的热点问题之一。

据古气候学家研究,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根据全球性的对比,“北京人”的时代(距今24—50万年)应包括3次间冰期和3次冰期(即3次冰川轮回)。然而根据周口店第一地点第3—10层中包含的动、植物化石,那3次冰期并不十分寒冷,而且那3次间冰期也不是非常炎热。因此有些古生物学家认为,“北京人”的时代只代表一次间冰期。

“北京人”是穴居者,能制造工具,会用火,还会采集和狩猎。正因为他们具备这些本领,他们才能适应周口店地区

的环境变迁,在那里传宗接代,至少生活了26万年之久。

根据古生物学家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的葛氏斑鹿超过1000头,而肿骨大角鹿则超过2000头。所以他们认为,“北京人”不仅具有猎取小动物的技能,而且还有猎取大动物的本领。他们还认为,“北京人”“在夏末和秋初较多狩猎斑鹿,而到冬季则猎取肿骨大角鹿”。当然,大型动物绝不是少数几个人所能捕获的。由此判断,“北京人”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适应性。

“北京人”的寿命是相当短的。据古人类学家统计,68.2%的人死于14岁之前,超过50岁的人仅占4.5%。可见他们生活之艰辛。

不过,“北京人”的命运比“爪哇人”更好些。“爪哇人”的头盖骨是在1891年由荷兰的青年医生杜布哇发现的。1894年,他发表文章,

定名为直立猿人,俗称爪哇人。这个发现公布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争论:是猿,还是人?甚至有人说是现代人中的白痴、畸形的人等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杜布哇本人后来也改变了观点,认为“爪哇人”应归于长臂猿属,与人的分类系统无关。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1940年他去世时。“北京人”则不然,其“人”的属性在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第一具头盖骨后,很快便被国际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了。为什么“爪哇人”和“北京人”的命运竟会如此不同呢?古人类学家认为,“爪哇人”的发现比较早。人类对自己祖先的认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所以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一下子是难以接受的。从1891—1929年期间,古人类学家在欧洲、非洲等地不断又有新的发现,如1907年在德国发现海德堡人的下颌骨;1924年在南非发现了南方古猿的头骨等等。虽然,南方古猿与现代人的关系远不如“爪哇人”和“北京人”,但这些新发现终究使人类对自己祖先的认识逐渐地深化了。更重要的是,周口店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京人”的发现不是孤立的,伴随出土的还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它们是“北京人”的狩猎成果;上万件石器,它们是“北京人”的生产工具;还有许多“灰烬层”,它们是“北京人”使用火的证据。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北京人”的层位(第3—10层)厚达数十米,是一座巨大的信息库。贾兰坡院士说得很好,“‘北京人’化石和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不仅把爪哇人从唯心主义的泥坑中挽救出来,尤其重要的是凭借这一发现和研究肯定了在‘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这一中间环节和在这一中间环节上人群大致的生活情况”。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北京人”一旦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立刻便被国际学术界所公认了。

周口店地区已发现有价值的地点20余处,除第一地点外还有3个重要地点:

1. 山顶洞人遗址:此洞靠近龙骨山的顶部,于是被命名为“山顶洞”。它是1930年被发现的。在1933—1934年期间由裴文中先生主持发掘。出土的有3具古人类的头盖骨,还有盆骨和股骨等等。据古人类学家研究。其发现被命名为“山顶洞人”,属晚期智人。经碳14测





在周口店竖立的地質調查所地界标记
1930年裴文中攝

定,山顶洞人距今2.7万年。与古人类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25件石器,磨光了的鹿角,140多件装饰品,如骨针、穿孔的贝壳、动物牙齿、河卵石、石珠和骨雕制品,以及33种哺乳动物的化石。考古学家认为,山顶洞

人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已经比较进步,会打扮自己了。在盆骨和股骨旁边,还发现许多赤铁矿颗粒。考古学家认为在山顶洞人时代,他们已会给逝去的先人举行葬礼了。

2. 第四地点,即新洞:此洞位于第一地点南约70米,入口窄而长,向南开口。洞口曾被混杂堆积物堵住,1973年经发掘被打开。该地点发现了古人类的左上第一前臼齿,属早期智人,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据北京大学考古系的铀系法年龄测定,新洞人距今10多万年。与“新洞人”同时出土的还有少量石器,4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3. 第十五地点:位于第四地点东侧,相距10米。它是1932年发现的,在1934—1937年间被发掘。在该点相继出土了大量石器,约1万件。哺乳动物化石亦相当丰富,据古生物学家统计达33种。其距今年代约与新洞相同。

贾兰坡院士认为,第四、十五地点可能与第一地点相连,所以这两个地点尚具进一步发掘的价值。

1999年冬,正赶上贾兰坡先生88岁寿辰。当我跨进他北京的寓所,向这位为了人类科学奋斗了一生的长者道声祝福,并捧上文汇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走过半个世纪·笔会文粹》时,老人连道:“谢谢,谢谢。”

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之一、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贾兰

